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中国动力与思考

——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周汉民: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意图重建世界贸易秩序,消除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其后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与1945年二战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

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这场会议历时7年半,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因应了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1986年,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我的恩师、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教授准备在上海外贸学院发起建立“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中心最后是在1988年正式成立。汪先生出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在汪先生谢世后,我接任主任。1992年,汪教授与我合著出版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这在当时国内尚属拓荒之作;1995年,我们又合著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在这本书中,我们对世贸组织项下有关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定义以及重要意义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解释。

WTO与关贸总协定的重要区别,在于WTO明确将国际贸易分为三分,分别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我们所说的服务贸易,在乌拉圭谈判之前几乎没有确切的定义,在谈判之后至今数十年间,成为世界贸易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WTO曾预测,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份

额可能提高50%,事实也是在朝这一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这1年多时间里,世界贸易中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巨幅下降,去年全球达到16万亿美元,降幅为14%。尽管服务贸易出口额也有下降,但总量已达到4.75万亿美元,降幅为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服务贸易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

就我国而言,我们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贸易是第一大国,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发展中。WTO将服务贸易分为了15个大类,100个子项,而这100个子项的不断开放,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服务贸易所有领域的开放,而且在规则制定和与时俱进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具体的例证是已经谈判成功、希望明年年初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它涵盖了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的所有100个子项的开放,还新提出了22个子项,同时对原有100个子项中的37个项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规定。由此可见,全球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贡献了重要动力。

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硕果累累。“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服务进出口累计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29.7%,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地位进一步巩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29.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去年的54.5%提升到了55.7%,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

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我国同样需要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前者而言,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将继续做实做深国内大循环;从后者看,我们也必须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开放的步伐会更加坚定,浦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区,在推动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中将制定许多新的规定和鼓励政策。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三者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同时,对应这三者发展,我国也搭建起了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出口有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进口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进博会”);服务贸易有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服贸会”),这些安排,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全力推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决心。

■ 扩圈、抓手、义务

记者:在全球疫情肆虐叠加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下,在“走出去”与“引进来”过程中,服务贸易是否更应成为传递减碳思路、甚至改变货物贸易游戏规则“隐身利器”?我们又应抓住哪些新抓手?

周汉民:当前,我国政府在严格履行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双碳”目标也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勾勒了更为广阔的前途:一方面,货物贸易生产和运输环节要加快全面走向绿色;另一方面,服务贸易要加快服务绿色发展。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交易本身就应是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刚才我提到,此前,世贸组织将服

务贸易定义为跨境服务的15大类,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服务贸易的传统分类恐怕已难以覆盖创新业态,比如现在就很难找到任何一类能涵盖碳交易的服务贸易。因此,中国实践正在为服务贸易范畴扩大、内涵深化和外延拓展作出新的贡献,而服务贸易的继续发展,也为国内“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抓手。

在全球气候变暖已到转折点的今天,中国还是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落实“双碳”战略在这一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的最为坚决的绿色政策,我们要特别明确了,第一,我们所谈的新发展理念、所推进的新发展格局都包含绿色意义;第二,我国已生效的民法典在其第509条第3款中明确规定了合同履行的绿色附随义务,体现了绿色原则对合同履行活动的责任约束。

未来,我们在实践中还可以围绕“双碳”目标,创设更多的规则,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 突破、坚守、期待

记者: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一直是服务贸易出口的三大主要部门。结合当前内外部形势,您认为这三大块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应如何克服困难、变化思路?

周汉民:从进出口份额上看,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仍然是进出口大于出口,这是符合国情的。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来说,排名第一的是旅游,疫情前,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了1.55亿人次,海外消费金额两倍于美国游客的海外消费;其次是运输,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海上、航空运输全球领先,加之中欧班列,使得我国运输业取得蓬勃发展,领先世界其他贸易伙伴;在其他商业服务当中,我认为跨境电商服务一定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极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就可可见端倪。

而这三项服务贸易形式,无论是受疫情影响,还是受全球经济不稳定、不明朗前景的影响,都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我认为我国要持续发展并加快服务贸易的势头,关键是抓住机遇。譬如针对疫情,世界公认疫苗依然是极为重要的防疫手段,我国国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超20亿剂次,同时,我国计划在今年努力实现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这是一个壮举,这也说明中国疫苗依然是我国乃至全球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利器之一,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物资。未来我们也应通过疫苗出口提供相关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而抗疫咨询服务就可能是一例。

至于运输领域,我认为无论是运输本身,还是运输保险等配套服务,我们有很多需要迎头赶上的地方。而在电商服务发展方面,中国当前最需要提升的是质量、品牌和售后服务,如果做得更好,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份额还将持续提升。总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前途光明。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即将召开。

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形势仍有反复的背景下,如期举办服贸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彰显了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决心,体现了我国支持全球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大国担当。

过去几十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什么?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中国服务贸易提供哪些实践经验?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对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进行了采访。

■ 探索、智慧、决心

记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动我们将持续40余年的“目光向外”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汪尧田教授与您在《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中所定义的服务贸易是基于全球化视野的,那么今天我们再讨论服务贸易,您认为和20年前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应有哪些新的发展?

周汉民: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意图重建世界贸易秩序,消除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其后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与1945年二战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

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这场会议历时7年半,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因应了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1986年,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我的恩师、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教授准备在上海外贸学院发起建立“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中心最后是在1988年正式成立。汪先生出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在汪先生谢世后,我接任主任。1992年,汪教授与我合著出版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这在当时国内尚属拓荒之作;1995年,我们又合著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在这本书中,我们对世贸组织项下有关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定义以及重要意义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解释。

WTO与关贸总协定的重要区别,在于WTO明确将国际贸易分为三分,分别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我们所说的服务贸易,在乌拉圭谈判之前几乎没有确切的定义,在谈判之后至今数十年间,成为世界贸易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WTO曾预测,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份

探馆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

助力乡村振兴,金融机构正在这样忙活!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作为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活动之一,“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日至7日在北京首钢园区10号馆、11号馆举行。围绕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带您提前探馆。

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去年由北京分行首次展示亮相,今年是农发行总行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农发行将紧紧围绕“数字金融、开放金融、绿色金融”主题,全力打造精彩纷呈的展览展示系列活动。

据了解,农发行将线下搭建农发行金融

服务展示体验专区,线上打造“云展馆”,召开专题成果发布会向社会发布多项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及产品。

在核心线下展区,农发行将运用高清LED大屏、展板展示、现场触摸互动等方式,融合多种元素,生动诠释农发行“支农为国 立行为民”的职责使命。届时,农发行将重点展示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家战略及区域协调发展、创新投融资模式、践

行绿色发展打造“绿色银行”以及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创造价值等领域的工作举措和成果。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国家开发银行2021年上半年发放贷款3129亿元,支持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点领域发展。

聚焦乡村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三农”金融服务新品牌。比如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打造“惠农e贷”“小微e

贷”“个人e贷”和“产业e贷”四项普惠金融金牌。在绿色金融板块,该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绿色产品服务,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以金融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个人金融板块,该行也将展示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数据”为驱动,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流畅的个人金融服务。

本次专题展上,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也将带来其在服务乡村振兴、服务百姓民生、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和成果。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该行正在探索创新线上信用贷款产品,以加快政务数据对接、平台数据对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与此同时,该行以小额“极速贷”为抓手,不断丰富数字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捷度。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已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累计发放涉农贷款1128亿元,服务客户2.3万户。

知识产权交叉学科建设,完成对文理法等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另一方面,应协调和优化知识产权在学培养及在职培养模式,制定更加贴合实战内容的教育培训方案。

其次,优化知识产权高端人才提升机制。一方面,积极搭建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引培平台,打通人才开发通道,建立和完善政策、目标、晋升、绩效、薪酬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另一方面,打造全周期的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孵化器。对关键领域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群体进行盘点,了解人才群体现状、能力短板、特质问题、发展方向,根据不同群体的能力需求特点设计人才培养项目。

最后,建设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国际网络”。建立知识产权高端人才“海外仓”,通过将高端人才布局到海外地区,扩大跨境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积极融入和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任职,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激发各类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的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务贸易定义为跨境服务的15大类,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服务贸易的传统分类恐怕已难以覆盖创新业态,比如现在就很难找到任何一类能涵盖碳交易的服务贸易。因此,中国实践正在为服务贸易范畴扩大、内涵深化和外延拓展作出新的贡献,而服务贸易的继续发展,也为国内“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抓手。

在全球气候变暖已到转折点的今天,中国还是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落实“双碳”战略在这一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的最为坚决的绿色政策,我们要特别明确了,第一,我们所谈的新发展理念、所推进的新发展格局都包含绿色意义;第二,我国已生效的民法典在其第509条第3款中明确规定了合同履行的绿色附随义务,体现了绿色原则对合同履行活动的责任约束。

未来,我们在实践中还可以围绕“双碳”目标,创设更多的规则,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 突破、坚守、期待

记者: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一直是服务贸易出口的三大主要部门。结合当前内外部形势,您认为这三大块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应如何克服困难、变化思路?

周汉民:从进出口份额上看,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仍然是进出口大于出口,这是符合国情的。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来说,排名第一的是旅游,疫情前,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了1.55亿人次,海外消费金额两倍于美国游客的海外消费;其次是运输,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海上、航空运输全球领先,加之中欧班列,使得我国运输业取得蓬勃发展,领先世界其他贸易伙伴;在其他商业服务当中,我认为跨境电商服务一定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极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就可可见端倪。

而这三项服务贸易形式,无论是受疫情影响,还是受全球经济不稳定、不明朗前景的影响,都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我认为我国要持续发展并加快服务贸易的势头,关键是抓住机遇。譬如针对疫情,世界公认疫苗依然是极为重要的防疫手段,我国国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超20亿剂次,同时,我国计划在今年努力实现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这是一个壮举,这也说明中国疫苗依然是我国乃至全球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利器之一,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物资。未来我们也应通过疫苗出口提供相关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而抗疫咨询服务就可能是一例。

至于运输领域,我认为无论是运输本身,还是运输保险等配套服务,我们有很多需要迎头赶上的地方。而在电商服务发展方面,中国当前最需要提升的是质量、品牌和售后服务,如果做得更好,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份额还将持续提升。总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前途光明。

知识产权交叉学科建设,完成对文理法等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另一方面,应协调和优化知识产权在学培养及在职培养模式,制定更加贴合实战内容的教育培训方案。

其次,优化知识产权高端人才提升机制。一方面,积极搭建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引培平台,打通人才开发通道,建立和完善政策、目标、晋升、绩效、薪酬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另一方面,打造全周期的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孵化器。对关键领域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群体进行盘点,了解人才群体现状、能力短板、特质问题、发展方向,根据不同群体的能力需求特点设计人才培养项目。

最后,建设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国际网络”。建立知识产权高端人才“海外仓”,通过将高端人才布局到海外地区,扩大跨境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积极融入和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任职,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激发各类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的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政策+市场” 让二手车市场火爆起来

本报记者 李元丽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约843.42万辆,同比增长52.89%,创造近年来我国二手车市场最好的成绩。“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或将突破1600万辆,增长率有望达到15%。”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对今年的国内二手车市场做出了大胆预测。

二手车市场为何如此火爆?据了解,一方面是政策的利好。今年以来,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二手车行业发展的政策,取消对二手车交易不合理的限制。如,从2020年5月份开始,二手车增值税由2%就降低到了0.5%;商务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不断简化二手车交易流程。另一方面,市场格局变化产生的影响。数据显示,5月中国新车销量减少3%,6月新车销量减少了12%,很多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

眼下,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历经十余年发展,新能源二手车析出率也日渐走高。打造健康有序的二手车流通环境,成为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603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约为493万辆。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10.3万辆,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7.8%,几乎达到去年全年的数量。

“新能源汽车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同时也意味着新能源二手车即将迎来高速增长,对于二手车行业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于琨表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能源二手车缺乏统一的鉴定评估标准及受产品质保、备件等客观条件限制,新能源二手车残值率普遍较低且具有更多不确定因素。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二手车市场,部分原价十余万元的两年期新能源车二手车,现残值不足新车售价一半,甚至有部分车辆的残值仅剩余2万-3万元。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团体标准T/CADA 17-2021《二手纯电动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并于7月1日正式全面实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方面表示,《规范》是我国首个针对新能源车二手车流通领域服务的团体标准,明确了二手纯电动乘用车的鉴定评估流程及方法,填补了我国该领域标准的空白。

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现阶段市场上对新能源车的感受还并不是很清晰,尤其是二手车市场。一方面,目前新能源车二手车大部分都是营运车辆,线上销售是其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当前新能源车主要集中在“高低”两端市场上,而这一部分车辆还未真正流入二手车私人用车领域的增长,未来新能源车二手车市场规模将会高速扩张,行业对此应保持极大关注。

税收筹划莫过头 ——中国经济怎么看之六十一

杨朝英

上周,某娱乐明星补税事件,引发税收筹划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税收是否需要筹划?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治理,结论都是需要的。但一定要合法、适度,不能搞过头了。

先讲一个故事。2018年6月,某上市化工龙头企业迎来了一个高规格视察团。领导对该公司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司突破了多项国际技术封锁,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树立了榜样。”

这个评价却让企业负责人有些尴尬——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会后,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申请了认证。第二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就从25%降到了15%。2019年,合并报表后的集团利润相比2018年基本没变,所得税却从34亿元直接降到了16亿元。

这也让该企业更加重视国家税收政策。比如,受惠于增值税留抵退税,2020年他们收到的单笔退税就超过1.6亿元。这些税收优惠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国家政策导向,可以说,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越积极、数量越多,说明政策效果越明显。

因为现代税收体系比较复杂,专业术语较多,企业内部财务人员难免会有遗漏,或理解不到位,这时聘请资深外部税务专家进行合理税收筹划,非常有必要。

不过,事过犹不及,税收筹划搞过头就得不偿失了。网络上充斥的“伪知识”,也需要睁大双眼仔细鉴别。

比如,有所谓专家说,企业要想不交企业所得税,可以购买一些名人书画,还能保值增值。

真的可以吗?当然没用。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就单列了一条进行强调: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用于收藏、展示、保值增值的,作为投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文物、艺术品资产在持有期间,计提的折旧、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

也就是说,只有资产变现后,它才能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还有某专业培训机构的专家说,并购亏损公司也是节约企业所得税的好办法。

这个说法非常有迷惑性,但本质上也不靠谱。因为不仅条件严格,节约比例非常小,而且可能有大坑。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符合特定条件的并购,可以适用特殊性重组税务处理。被合并企业的亏损可由发起并购公司弥补,但有限额。计算公式为: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这意味,如果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为负,一分钱亏损也不能并表;如果为正,能并表部分也仅为收购价3%左右(我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很少超过3%),对税收的影响可以忽略。

更严重的后果是,如果买到一家隐藏巨额债务的公司,那就是个无底洞了。